

概 述

今年 11 月 12 日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 130 周年。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事业与天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三莅津门，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且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首莅津门上书李鸿章 改良幻想 破灭离津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十九世纪末，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中国政治制度腐败、经济落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允许列强在许多沿海城市建立租界，如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等地，几乎成了侵略者的天下。

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他幻想着通过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方面卓有成就的洋务派首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能使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于是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之后，偕陆皓东赴沪拜访同乡《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并在郑家碰到了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王韬的老友罗丰禄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这样，王韬给罗丰禄写了封信，介绍孙中山通过罗氏到天津去见李鸿章。

于是在 1894 年 6 月间，孙中山偕陆皓东由沪赴津。抵津后下榻坐落于法租界的佛照楼旅舍（今天津市和平区哈尔滨道 48 号）。

直隶总督行署在老城的东北角(今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东风影院一带),初为饷道衙门,后改为长芦盐课察院衙署。1860年天津开埠后,盐院裁撤,又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署。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后,即以此为直隶总督行署。当时直隶总督署在保定,自李鸿章兼北洋通商大臣后,除了封河的季节之外,则常驻天津。

当时,孙中山来天津是渴望能见到李鸿章,倾诉自己的救国主张。《上李鸿章书》就集中了孙中山关于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以图中国富强的革新主张。其中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事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希望李鸿章采纳他的主张,实现他为国家谋富强的愿望。

但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获接见,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也遭到拒绝。而在津期间孙中山又看到了清廷官员的腐败性。对此孙中山于1897年3月1日在《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记:“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来请求任命,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又如当时“天津铁路局是受人民重视的,并且运输量很大,可是它破产了。因为他在任意胡行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员也争着去拿钱贪污,其结果自然是铁路破产。”而天津铁路局又是李鸿章办的。孙中山通过发生在李鸿章身边的事情,联系到自己救国主张遭到拒绝,进一步看清了清廷专制的腐败与反动。

因此,孙中山偕陆皓东离津转道上海赴檀香山,在1894年11月24日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孙中山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明确提出了“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从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同时，孙中山也完成了由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伟大转变。而这个思想转变，与他在天津上书李鸿章的事件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为振兴中华再莅津门会晤袁世凯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于12月29日在上海召开的17省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即遭到帝国主义在外交上拒绝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威胁恫吓。袁世凯则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和谈的两面手法，逼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当大总统。于是袁乃胁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15日临时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袁发誓“共和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当然，历史证明这都是鬼话。

1912年4月袁世凯组织北京政府，建立了北洋军阀专制统治。8月上旬，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内政纲领。当然这是袁氏为了稳定政局、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搞的权宜之计。孙中山于8月18日乘安平轮离沪北上，23日午时抵塘沽，并发表了对记者的谈话，表明北上之目的是“在振兴实业，但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入手。”他又在致宋教仁的函中更明确指出：“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事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力于铁路之建设，于

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23日下午5时35分，孙中山抵津，各界代表、军乐队齐集招商局码头（今营口道东头）恭迎。北京代表梁士诒、直隶都督张锡奎、同盟会代表张继等上船谒见孙中山。欢迎人群脱帽欢呼中国第一伟人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军乐队奏欢迎歌，警察行举枪礼。孙中山登岸后，即乘车赴利顺德饭店。晚八时，张锡奎在该店宴请孙中山，并请各界代表作陪。

8月24日上午9时，孙中山应邀出席同盟会燕支部及广东同乡在广东会馆（今天津市戏剧博物馆）的欢迎会。由张继致欢迎词。孙中山在演说中指出：“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望革命中人此时较破坏专制尤应牺牲一切，加千万倍之力共谋建设。”继之孙中山赴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之官绅欢迎会并发表演说，略谓：“近吾国颇有南北界之说，其实非南北之界线，实新旧之界线。南方人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者尚所在皆是，盖因其无新知识，故一家之中父新而子旧、子新而父旧，新旧之分家庭中尚不能免。惟望吾到会同胞随时随处用力开通，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演说后孙中山参观了设于公园的劝工陈列所，并在此用午膳。下午二时四十分，孙中山率随员在新车站（今北站）离津赴京，张锡奎及各界官绅代表恭送。

孙中山此次在津期间，曾有袁世凯总统府的一个秘书告诉孙中山，袁氏有加害黄兴之意。孙中山打电报将此事关照了黄兴。8月27日黄兴特电袁世凯质问此事，袁回电矢口否认有其事，并且否认总统府有这样一个秘书。

9月11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画全国铁路全权”，被接受。9月19日孙中山自北京赴太原视察。在津之广东会馆同人致电孙中山，恭请他再度来津畅叙乡谊。9月21日广东会馆接到孙中山的复电，知其一定来津，遂决定23日在广东会馆开欢迎会。是日广

东籍到会者 600 余人,孙中山于上午 11 时到会,与大家晤谈,勉以努力爱国。

24 日早 8 时半,孙中山离津赴唐山、榆关等地视察工作。25 日晚 7 时余,孙中山返津,在火车上住宿一夜。26 日早五时,孙中山赴济南。

从孙中山此次往返天津的日程中,可以看出他为贯彻其实业救国的理想而不辞辛劳的精神。1912 年 10 月 10 日孙中山在《中国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中曾记述这次北上活动:“游踪所至,西北及张家口,西达太原,并历山海关与济南,无处不发现人民有同样之态度,即对于新事业之同情的感觉,与对于强大统一之中国的希望。”从而使他感到“自此次游历北地,与北方人士接触,余益信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之一等强国。”而“尤其重要者,则为保障统一之真实,盖中国统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统一兴盛,则中国将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之欺侮与宰割。”“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主义之行于吾国必矣。”虽然,在军阀混战的旧中国,孙中山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实现,但其对铁路建设的宏伟规划,为后人提供了建设铁路事业的宝贵资料。

三、三莅津门下榻张园二十七天 为和平日理万机

1924 年 10 月 23 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推翻了曹锟的北京贿选政府。于是,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谈建国大计。孙中山按照既定的对内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用以消除军阀割据,争取民族独立,达到国内安定和平的政治目的之方针,毅然决定北上。

1924年12月4日上午11时45分,孙中山所乘北岭丸轮绕道日本抵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受到党政军工商学及市民团体的热烈欢迎。冯玉祥的代表徐谦、焦易堂,张作霖的代表杨毓珣,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吴光新,黎元洪的代表李根源、熊少豪,直隶省府代表杨以德,以及京津国民党、各团体代表王法勤、叶恭绰、蒋梦麟、吴子才等上船谒见孙中山。随后,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专车至张园(今鞍山道59号天津日报社旧址)行馆下榻。各欢迎代表随至,孙中山与大家合影留念。

4日下午,孙中山偕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十余位随员赴曹家花园(今河北区黄纬路的254医院)访晤张作霖。落座后孙中山说:“我今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来欢迎,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李烈钧插话说:“事情虽是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吴佩孚之流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按:指张作霖)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唯有雨亭能当此一贺啊。”张作霖闻听后始显露笑容。这时孙中山也说:“协和(按:指李烈钧)的话说得对,回想自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唯有雨亭一人而已。”谈至此,满座皆笑。孙中山又感谢张氏历年来的帮助。张乘兴对孙中山说:“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孙中山说:“本人主张五权宪法,当提出国民会议公决。予非赞成共产主义,予乃社会政策,正所以导引共产主义者入于正轨。”张复劝孙中山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事,暂缓施行。孙中山表示不同意。

孙中山回到张园后,觉肝气发痛,即请德国医生施密特诊视。据诊断是因旅途劳顿,食物不消,以致胃痛,肝部因之而肿,须静养。其实孙中山此时已患肝癌。

5日下午3时许,张作霖入张园回拜孙中山,至卧室,孙中山欲起坐,张按之使止,说:“今天来是我向先生说话,先生听就是了,不用回答。”孙中山说:“予已嘱民党勿做官,望君提倡废督裁兵。”张说:“吾先自行解职,请先生劝国民军勿扩充军队。”孙中山说:“直隶系倒,拥兵目的已失,任何方面均应裁兵。”然后由孙科、汪精卫招待张作霖在客厅休息片刻,张返回曹家花园。

此后至31日,孙中山的病情逐渐加重,入张园给孙中山诊病的医生有德医施密特,日医田村、小管勇。

孙中山在张园的27天,为国操劳,日理万机。据粗略统计,仅以大元帅名义在张园给部下发出的指令、训令等,就有118件;在张园接待的各界代表,见诸报端的就有68人;并在张园发出了长文《孙中山抵津后之宣言》,草拟了建国意见25条。当时孙中山先生虽然已是肝癌的晚期患者,但他为了消除军阀混战、废除不平等条约,达到和平、统一、救中国之目的,仍是日夜操劳。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4年12月31日上午10时许,雪后气寒。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其诸随员由张园起身至东车站(今天津站)乘专车入京。各界代表齐集车站欢送。从此,孙中山先生结束了在天津的生活。

第一章 首莅天津 图谋宏业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和先行者孙中山，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1866年11月12日）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幼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日新的粤语谐音），以后在广州、香港、澳门学医，行医及游历欧美各国时多用逸仙之名。直到十年后——1897年，赴日本、考察、活动，始化名为中山樵，孙中山的名字由此而广泛传布开来。

孙中山生逢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国，肆意践踏中国的土地，劫掠中国的财富。腐败昏庸的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签订屈辱条约，将大片土地和巨额财宝拱手让给强盗。中国人民大众一次又一次奋起斗争，包括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意图通过改良变法等维新运动以苟延残喘，但已难挽救崩溃灭亡的趋势。面对中华民族各阶层民众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剧变时代，孙中山以毕生的才华、智慧和精力，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革命事业。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进行了英勇无畏百折不挠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建立了举世闻名的丰功伟绩，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领袖人物，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的创立者和领导人，最先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中国资产阶级革

命民主派的政治纲领。也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奠基人和领袖，创制了一整套《革命方略》，确定了施政纲要、对外政策的具体政策方针，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阶段。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百六十余年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中华民国，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宗旨，为二十世纪初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屈辱的苦难中国人民，掀开了民族自尊自强的新篇章，从而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他坚决遏制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反袁斗争和护国运动。他撰写出《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知难行易》等许多在革命史、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永放光辉的不朽名著。他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采取团结合作的立场，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主动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的阶段，奠定了第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促进了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蓬勃发展。

孙中山自青少年时代便参加劳动，刻苦学习，以天下兴亡、祖国盛衰为己任，立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向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无私无畏的革命征程中，他自觉建构和不断完善民主革命的政治思想体系与哲学伦理观念。诚恳宣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坚定不移地反抗帝国主义各种侵略行径和强盗逻辑，坚决站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阵线一边。他鞠躬尽瘁，为此奋斗到最后一息。临终时，他坚信和热切期待中华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在共同奋斗中取得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先生为了祖国、民族的自立与强大，到处奔波，千方百

计,不辞劳苦,不畏艰难险阻,跑遍了欧、美、日及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中华大地南北,也留下了他许许多多的革命足迹。天津市,特别是天津市河北区,也与他结有很深的革命因缘与骨肉情份。至今河北区依然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路、街道、学校、公园、商厦和饭店。人们时时传颂着他的光辉业绩和感人肺腑的故事。今年——1996年,值其13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这部文史著作就从中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1894年)的夏天,28岁的孙中山不惜长途跋涉,从广东千里迢迢来到天津,上书李鸿章并要求面陈政见的事件写起。

一、上书李鸿章改良幻想破灭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1894年6月,特为上书李鸿章^①面陈政见,第一次来到天津。此行,是他一生中在思想上发生质变的关键时期。

孙中山幼年参加农业劳动,青年学医、行医,因受到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以济世救民为己任,以“天下为公”为理想。他在青少年时期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教育和民主思想。1878年5月结束了传统文化的私塾教育,随母亲去檀香山看望胞兄孙眉^②。第一次离乡到海外,大开眼界。他后来自述:“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此后就在当地上学。先入英监督所掌之意奥兰尼学院(Iolani Collage, Honolulu——火奴鲁鲁,即檀香山的另一称谓)补习英文。三年后毕业再入美人所设该地最高之学府奥阿厚学院(Oahu Collage, Honolulu)学习,1883年7月毕业,自檀香山启程归国。在家乡居数月后,即往香港。先入拔萃书室,转年4月转入香港英国当局所办的中央学院。11月,接孙

眉函召,在香港辍学,再赴檀香山。1885年4月,自檀香山回国。5月在翠亨村与同县外壘村人卢慕贞(1867—1952年)结婚。8月往香港中央书院复学。转年春夏间在该校毕业后,入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读书。此时,孙中山除习医外,还从师学习中国经史,并在同学中结识了与会党关系密切的郑士良^③。1887年10月,香港伦敦传道会与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创办了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孙中山因其教学设备和师资条件较优,在香港又便于发表政治言论,乃转学到该校,与何启、孟生、康德黎^④开始结交。何启曾发表过不少鼓吹改良主义主张的论文,后汇编为《新政真铨》出版。当时孙中山在思想上受到何启的一些影响。此后,他在该校就读五年,勤奋学习。除正课外,广泛研读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尤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课余还进修中文。他后来概述其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此为孙中山游学之大略。

孙中山才大志高,加之中西之学贯通,较系统地接触了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此时,他“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48页)众所周知,传说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一般认为他约于公元前7年至公元前4年间生于罗马帝国的属国伯利恒,亦称犹太(后改为行省,在今巴勒斯坦)。耶稣在犹太贫苦人民中传教,公元30年左右被罗马派驻犹太的总督本丢·彼拉多判处极刑,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教称他为基督,即“救世主”。早期基督教遭到罗马帝国的压迫,具有反对罗马统治的性质。其教义主张忍耐服从,“爱人如己”,幻想死后升天堂。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后进一步确定为国教。其

经典称《圣经》，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其教派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唐代传入中国，称景教。汤、武，分别是我国商朝和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华盛顿则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著名领袖、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者、美国第一任大总统。由此我们可知孙中山青年时代的宗教信仰及其非同一般的志向。

1892年7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初在澳门创设中西药局，悬壶问世，以外科解剖术蜚声于时。曾在镜湖医院剖一砂淋，大如鸡卵，权重之一两，七钱有奇，时人诧为罕见。因营业日盛，大招葡国（指葡萄牙）医生所忌。澳门例，非在葡政府取得行医执照，不得在当地操业。总理（指孙中山）受葡医所排挤，遂不能在澳门立足，旋复设东西药房于广州洗基。以存心济世，赠药施医，所业较澳门尤为繁荣。”孙中山作为一位良医，虽然能治愈了国人的病症，却医治不了中华民族的创伤。这是摆在孙中山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

当时中国处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允许列强在许多沿海城市建立租界，如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几乎成了侵略者的天下。而天津就是当时中国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有英、法、美租界，各踞一方，实施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现实，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1893年冬，孙中山与陆皓东^⑤、郑士良、尤列^⑥等人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内的抗风轩聚会。孙中山提议：“吾人既同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经发起一会，名曰兴中会。众赞成之，而未有具体之组织，是为兴中会倡议之第一声”。（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26页）

可是，孙中山在提议创立兴中会不久，因受当时流行的改良主

义思想的影响,又去从事一项同“驱除鞑虏”的意愿相违的工作。回到翠亨村草拟上李鸿章的书稿。

孙中山为什么会想起上书李鸿章呢?据分析有下列原因:

1. 李鸿章是当时洋务派首领,创办了许多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他又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创立北洋水师学堂,建立北洋海军。

2. 李鸿章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又有其淮军的军事实力,掌握着清廷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

因此,孙中山幻想着通过这位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掌管清廷政务的李鸿章,促成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

于是,在1894年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就书稿内容,同陈少白^⑦商酌修改。而后,偕陆皓东赴上海,走访改良主义者郑观应^⑧。郑氏关心时政,热心西学,为洋务派出力,而在思想上与洋务派又有分歧。以“道”、“器”的关系表示旧学和新学的对立,并以“由博返约”作为向西方学习的途径。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认为欲张国势,就必须改变专制,实行议院制,广办学校,培养人材。谴责洋务派“舍本图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根本不可能抵御外侮。这种主张,与孙中山的书稿内容不谋而合。在郑观应的家中,孙中山还结识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王韬^⑨。经王韬介绍决定去天津找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⑩,设法求见李鸿章,俾可当面陈述自己的抱负。对此,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上李鸿章书之经过》中记: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按:指孙中山)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象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他说:“这些事

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他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纸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稍为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办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诠)。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 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下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与他一见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按：指罗丰禄)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见《辛亥革命》一)

于是，在1894年6月，孙中山偕陆皓东由上海乘轮赴天津，向清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他们来津后下榻于坐落在法租界的佛照楼旅舍(今天津市和平区哈尔滨道48号)。当时，李鸿章就住在直隶总督行署(原址坐落在今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南口西旁的东风影院)。此地最初为饷道衙门，后改为长芦盐课察院衙署。1860年天津开埠后，盐院裁撤，又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署。1870年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即以此为直隶总督行署。众所周知，当时直隶总督驻保定，因李鸿章兼北洋通商大臣，故除了封河之季节外，便常驻天津。孙中山的下榻处与直督行署之间，由天津

旧城相隔，一南一北，约有十里之遥。

孙中山当时作为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千里迢迢来到天津，渴望见到闻名中外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倾诉自己的救国主张。《上李鸿章书》，就集中阐述了孙中山关于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以图中国富强的革新主张。他在书中指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事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在仿行西法方面，他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见《孙中山全集》一卷8页），并表示将为此游历国内外，参观考察。希望李鸿章采纳他的主张，从而实现他为国家谋富强的愿望。

但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获接见。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也遭到拒绝。经过这一挫折，加以官场中颓靡、贪污、贿赂公行的现象，使他进一步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性和反动性，从而丢掉了幻想。对此，孙中山于1897年3月1日在伦敦出版的《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记：“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有很好的机会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整个国家各部分成群而来请求任命，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送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又如当时“天津铁路局是受人民重视的，并且运输量很大，可是它破产了。因为他在任意胡行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员也争着去拿钱贪污，其结果自然是铁路破产。”（见《孙中山全集》一卷99—100页）而天津铁路局又是李鸿章创办的。孙中山通过耳闻目睹的这两件发生在李鸿章身边的事情，联系到自己的救国主张遭到拒绝，因此认清了清廷的腐败与反动。从而促使孙中山坚定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这在孙中山的一生中是个重大的思想转变。

注：

①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字少荃。道光进士。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军,在安徽练乡勇,建淮军。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洋务派首领。

②孙眉(1854——1915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德彰,号寿屏。孙中山长兄。1894年加入兴中会。1907年由檀香山归国,居九龙。1909年冬参加筹备广州新军起义,在九龙联络会党,1911年组织民军响应武昌起义。

③郑士良(1860——1901年),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原名振华,字安医,号弼臣。1895年加入同盟会。1900年奉孙中山命领导惠州三州田起义,失败后避往香港。次年8月,在赴友人宴会时被清奸细下药毒死(一说中风而死)。

④孟生(P. Manson),又译孟臣、万臣、门森。生卒年不详。原香港西医书院首任教务长。

康德黎(1851——1926年),英国医生。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曾从之受业。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中国使馆拘禁,经康氏多方营救得以恢复自由。著有《孙逸仙与中国之觉悟》一书。

⑤陆皓东(1867——1895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原名中桂,字献香。1895年与孙中山组织香港兴中会机关,谋于10月26日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并制定青天白日旗为革命军旗。因奸人告密,事败被捕,遭杀害。

⑥尤列(1866——1936年),广东顺德人。字令季,别字少纨。1895年与孙中山等人组织香港兴中会机关。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称帝,组织救世军。1921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顾问。此后即脱离政治活动。著有《四书章节易解》、《四书新案》等。

⑦陈少白(1869——1934年),广东新会人。原名闻韶,号菱石。1895年与孙中山等人成立香港兴中会机关,筹划广州起义。1905年香港同盟会成立,被举为会长。1921年任孙中山总统府顾问。晚年致力于家乡建设。著有《兴中会革命史要》、《兴中会革命

史别录》等。

⑧郑观应(1842——1922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待鹤人。1880年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1906年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著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

⑨王韬(1828——1897年),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韬,别号韬园老民、天南遁叟。著作有《韬园文录外编》、《韬园尺牍》等。

⑩罗丰禄:福建闽县(今闽侯)人。字稷臣。光绪初任驻英、法使馆翻译,1878年调任驻德使馆翻译,嗣入李鸿章幕。1896年以记名海关道赏四品卿衔,任出使英、意、比大臣。1901年改为出使俄国大臣,未就任。

二、奔赴檀香山 组建兴中会

也许李鸿章当时确实因为军务在身,无暇顾及孙中山及其上书。正如陈少白回忆:“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争,打得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办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辛亥革命》(一)28页)对于孙中山领取出国护照一事,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近代史教授薛君度认为:孙中山“这次上书,虽然没有见到李鸿章,但是,孙设法从李鸿章的僚属处得到帮助,取得了一个在